

沂水縣文史資料

第五輯

沂水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目 录

沂水青年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尹平符	1
抗战胜利前的一次县参议员大会	尹平符	13
李清漪年谱	李守玉	16
李泮溪烈士墓志铭	靳星五	25
毛泽东致于学忠信（抄件）		27
跟随着于学忠在沂水见闻	李希章	28
于学忠部五十一军始末	李希章	65
忆抗日时期的鲁苏战区	李景圻	83
圈里、唐王山和城顶山抗日作战亲历记	李景圻	122
刘南宅及其大殡	张希周 张之栋	142
漫话沂水老客店	张希周	155
“四·八”遇难烈士纪念碑简介	马玺伦	160
山东沂水发现一汉代铁器窖藏	马玺伦	163

沂水青年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尹平符

一、奔赴延安

“七·七”事变爆发，日寇大举入侵我国，中华民族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中国人民从此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沂水县共产党及各界爱国人士也奋起组织抗日团体，建立抗日武装，动员民众，开展宣传，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当时，全国进步的知识分子为追求革命真理，纷纷奔向革命圣地延安。沂水县当时在临沂乡师读书的共产党员王富春（王涛），周锡祜（周之同）和在瑞溥小学任教的李松舟、尹平符四人也同全国进步知识分子一样，为了共同的革命理想，跋山涉水，奔赴延安。

1937年10月，李松舟同志告诉我延安抗大招生的消息，并说王富春、周锡祜准备去延安。李征求我的意见，我自然欢欣鼓舞。于是辞掉瑞溥小学的职务，筹措路费，欣然登程。

我们从沂城出发，经临沂、台儿庄步行至徐州。

素为兵家必争之地的徐州，火车站上，从华北、东北涌来的人群在这里聚散，或奔阜阳，或去武汉。人流中有国民党军政官员，或寻安身之处，或继续作升官发财之梦，更多的是前线溃退下来的士兵，夹杂在流亡的青年学生之中。当我们登上火车后，车厢里杂乱喧嚣，拥挤不堪。有的甚至被挤下火车道摔死摔伤。

陇海路上的火车时开时停。行进到风陵渡时，为避敌空袭炮击，便趁夜偷渡，缓缓而行。

火车到达历史名城西安，黑色砖城墙上写着“团结御侮”四个大字，据说是“西安事变”时青年学生的手迹。我们一行在西安一家报馆里找到了王光华同志，他是沂水1933年武装暴动后跑到外地，又与党取得联系后来西安工作的。由王的介绍，我们来到了八路军驻西安七贤庄办事处。那时虽已形成了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局面，却仍然笼罩着国民党“限共溶共”的恐怖气氛。在办事处门前有一纸烟店，

里面就有国民党暗设的特务专门监视我党人员的活动。

在办事处，我们又被介绍到西安以北九里的三原县云阳镇。刚入三原县境，就受到杨虎城部队的盘查，好在当我们说明来自山东沂水时，由于杨部曾驻防莒沂，才顺利通过。

二、在青训班

在云阳镇，有以西北青年救国会名义开办的青年干部训练班，是我党中央派出冯文彬、胡乔木等领导同志主办的。校址在一座破庙里。训练班聚集着来自五湖四海的热血青年。有来自上海、南京、江苏、山东的，还有来自南洋、新加坡等海外的朋友。这些青年，出身于旧中国社会各阶层，有的身穿长袍，头戴礼帽；有的短衣短裤，或军衣，或学生装；有的西装革履，手提皮箱；还有穿旗袍的女子。听课时，学员们集合在破庙的广场上，或以砖代凳，或在背包上屈膝而坐。夜里就睡在破庙的谷草铺上，醒来时或跑步或唱歌，生活艰苦，以苦为乐。青训班的领导和教师为我们讲解国际国内形势、中国国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革命的“三民主义”等，极富哲理，通俗易懂，学员们耳听手记，课堂上鸦雀无声。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和理想，学好革命理论，投入抗日运动，献身革命，报效祖国。

这个青训班实际上是抗日军政大学的“预科”，也是初步考查新学员的考场。所以当学习了一个阶段后，举行了毕业典礼。这时领导上提出了抗大招生的问题。我们从沂水来的四人很顺利地被批准去延安抗大学习。但也有不顺利的，有一位从日本归国身着军装的同学就没被批准。青训班指导员焦力告诉他，去延安五六百里路程，沿途有国民党特务和土匪，是有危险的。但后来我们在延安抗大学习时，竟又碰到了那位不相识的同学，原来他不是乘汽车而是徒步来到延安的。据说毛主席曾讲，青年们冲过重重封锁来到延安，就是很大的考验了，不必再经入学测验，编入班内学习好了。可见党是极为理解和关怀不顾个人安危、真诚干革命的一切进步青年的。

三、就学抗大

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前身是红军大学。当

时校长在前线，教务长罗瑞卿同志领导着教学。我们到抗大后编入第三期（前两期是红大）。刚到校住在红大二期学员挖的窑洞里，不久又搬到施县城里的城隍庙旧址。

在这里我们见到了王光华同志，他也是从西安来抗大学习的。我们还见到了二十年代在外地做革命工作的杜作桢（杜剑华）同志，当时他在中央党校工作。这样从沂水来延安的同志，据我所知，已经有六名了。

从1938年1月5日到达延安起，我们编班后穿上了灰色棉军装，腰扎皮带，红色领章，成为光荣的八路军，开始了军政院校的学习生活。

过去曾经读过艾思奇所著《大众哲学》，雷峰塔的故事记忆犹新。这时艾思奇和任白戈两位同志为我们讲唯物论和辩证法，从事实出发，用启发引导的方式，结合解决我们一些唯心论的糊涂观念，深受教益。特别是党中央领导同志对抗大的教学非常关心，或兼讲课，或作报告，使我们有机会亲聆革命领袖的教诲。毛主席知识渊博，他那高瞻远瞩的见解，幽默诙谐、深入浅出的类比，使人听了豁然开朗，

顿开茅塞，久久不能忘怀。毛主席以革命必胜的信念，教导大家怎样克服悲观论、速胜论，打败日本侵略者。他说，人人都有“生辰八字”，中国也有个“生辰八字”，叫做“先败后胜，转弱为强”。我虽不是算命先生，确能断定这个“八字”。为什么？日本人目前的胜利，就是它的失败，如同陕北人好吃辣椒，调一茶盅辣的不得了，调在盆里就成了一盆辣汤，如果放在大缸里，仅仅有点辣味，若放到大海里，就是点眼也不觉其辣了。用以比喻日本人侵略中国，侵略地区越大，军力越分散，怎能不败！又说，中国的失败就是胜利。我国有句古话“失败为成功之母”，只要能总结经验教训，就会越战越强。敌人到处杀人放火，激怒了中国人，则夺取其武器，义愤填膺，就会战无不胜了。讲到游击战术时，主席说，如同跳蚤，敌人睡觉吃饭，你去打枪打炮，弄得他寝食不安，要吃饭睡觉，就得退到东北去，东北也呆不下去，只好回到日本去。他象一头疯牛，你不能截头打，只好让开头扯它的尾巴，还有斯大林双手拿着锤子要敲它的屁股呢！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有一次毛主席讲论持久战（初稿），是在延安城墙下一个草坪上，摆了一张大桌子上大课。最后讲到抗战的胜利，他说，一般人做文章都有一个套子，“自芦沟桥事变以来”开头，“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结尾，中间的文章内容要大家来做。战士用枪来做，文人用笔来做，农民用锄来做，老太婆用纺车来做，……。大家集体创作，就完成了大块文章。

到校讲课的中央及有关部门的领导还有李富春同志，他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仿吾讲国防教育，徐冰、张心如讲马列主义。总之，用革命理论与军事思想武装学员的头脑，为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培育人才。

在抗大期间，除听课、学习讨论外，在集合或课外活动时，则歌声嘹亮，此起彼伏，义勇军进行曲咧，游击队之歌咧，延安颂咧，抗大校歌咧，啦啦队互相挑战，彼此呼应，真是声震山岳，气荡山谷，呈现出一派“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景象，战士们“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三八”作风在逐步形成，为民族解放和崇高的革命理想而准备着一切，中华民

族的希望就寄托在革命的摇篮延安。这与当时国民党政府所在地的武汉那种死气沉沉的气氛形成鲜明的对照。

在抗大，有幸见到了崇敬已久的周恩来同志。有一天，延安机场上降落了一架飞机，人们猜测到一定是位重要人物到来，果然是周恩来同志从“大后方”武汉飞来。在城北门外的大操场里，搭起了一座讲台，周恩来同志登台为我们作国际国内形势报告。他身着蓝布棉衣，英姿勃勃，精神奕奕，侃侃而谈。他的讲话给我们以抗战必胜、革命必成的信念与力量。

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我们的学习时间缩短了。在毕业前的一次报告会上，毛主席提到在敌后打游击，说聂荣臻大闹五台山。在津浦、京汉两条铁路之间可以建立革命根据地。而象《水浒》中一百单八将所在地的山东，如沂蒙山区，也是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好地方。还教育我们如何做群众工作，例如当教员就是打开群众之门的敲门砖。还有如恽代英同志提倡过的办农民训练班，都是容易做的工作。只要人民群众觉悟起来，又有敌人当运输队长送来

武器，就可以打游击，建立革命根据地。关键问题是干部，如抗大学员毕业，可以到江南扩大新四军，也可以到山西补充一一五师，还可以到敌后搞群众工作。毛主席指出的方向，后来都一一实现了。

1938年4月，我们提前毕业了。同学们唱起了毕业歌“别了，别了，同学们，我们相会在前线！”

四、到前线去

学员结业后，要去的方向就是毛主席在报告中指出的。我们从沂水来的四人都在白色恐怖下参加过一些革命活动，有的要求入党，有的在武装暴动后失掉了组织关系，要求恢复组织关系。我和李松舟同志为便于解决入党问题，便提出回到后方家乡从事统战工作，旋被批准。王富春和周锡祜两位留在延安继续学习；不久即去一一五师。

我与李松舟在西安乘车抵达徐州。此时，苏鲁战区在徐州召开了台儿庄大捷庆祝大会，还开了一个牛振东旅长阵亡追悼会。在徐州，我们遇到了沂水老乡刘自然，他是代表王德林（原

东北抗日联军一军官)部参加祝捷大会的。我们相约一道，经陇海路的新安镇，走到临沂城住下。此时日寇正围攻临沂城，城周围战斗激烈，整夜枪声不绝于耳。次晨敌机又来轰炸，我们住的旅店旁边就投下一弹爆炸。我们紧急行动，顾不得整理行装，用长衫包起了28册《解放》杂志(离校时杜剑华同志赠送的)，出城门奔向东南，然后避过敌火线返回沂水，参加了刚拉起队伍的四支队六大队。

六大队驻城西公家疃，队长是鲁宾，是上面新派来的干部。刚出狱不久的邵德孚同志任政委。他对我们是熟悉的，当即派我们到各地扩军拉队伍。从此我和松舟同志因工作不同，各奔一方。直到1954年我去南京时，才和他(当时在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工作)再次晤面。

附记：

后来我得知王富春同志1938年随一一五师回到山东工作，周锡祜同志一直在部队工作，李松舟于1979年去世。

1963年后我与李松舟同志通信联系，共同回忆了一些往事。从信中得知，他在1923年由

王尽美、邓恩铭介绍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改为C Y)。其兄李泮溪也是由王、邓介绍去上海社会大学学习并在那里入党的。1927年泮溪牺牲后，松舟同志因组织上没有发展他入党，就安于团员身份，隐蔽起来，搞些宣传工作，而对共产党的信念始终坚定不移。

1931年冬，我与在青岛教学的李松舟结伴回沂水家乡。那时据说沂水党组织恢复了活动，可他却仍然没有接上关系。我们第二次相聚是1935至1937年在瑞溥小学任教时。此时，沂水的党团于1933年武装暴动后和上级失掉了联系。1936年春，在上海作革命工作的王光华同志奉命回沂水恢复党组织活动。王分派我两项任务，一是为本县党组织与上海党组织的中间通讯联络人，二是在瑞溥小学发动抗日救国会的活动。第二项任务，经我们研究，由李松舟担负起来，因他在教师学生中有较高的威望。直至1937年10月，我们一起奔赴延安，在思想感情上都是一致的。

1979年，在雨花台烈士陵园工作的李松舟回山东泰安探亲，我得知后和他相约晤面，以便共同回忆往事。谁知不久，他接到单位通

知回去听传达中央一号文件，回去后，由于心情郁闷，再加血压高而与世长辞。可惜松舟同志没能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的祖国新局面。如果松舟同志九泉之下有知，该是何等欣慰呀！

谨以本文兼悼松舟同志

朱学民整理

抗战胜利前的一次县参议员大会

尹平符

沂水县参议会是1940年3月22日在九区高家庄子（现属蒙阴县）成立的。当时，她是山东省第一个县参议会，被誉为“沂蒙山区升起了一颗民主政治的巨星”。会议推举邵德孚为议长；王翰卿、李贯一为副议长。

1944年5月，沂中县参议会改选，选举杨希古同志为参议长；吴金鹏同志为副参议长。会议在金泉区望仙院（现属院东头乡）召开。

同年8月，山东省鲁中军区攻克沂水城，全县人民获得了解放。沂城解放后，沂水县民主政府及县参议会随即进驻沂城区（现黄山铺镇）的刘家河北村，开展新解放区的工作。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之后，沂水县参议会在中共沂水县委的领导下，召开了一个新的，也是沂水县最后的一次县参议员大会。

这次大会的时间约在1945年春、夏之间

(具体日期失记)，在沂城区的岳庄村召开。会议是按照党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按“三三制”原则的指示进行的，由于抗战形势的发展变化，这次大会除仍在当地的原参议员参加外，又经各方酝酿，新吸收了一部分参议员。笔者当时任参议会秘书。记忆所及，参议员中除正、副参议长和原有的常驻参议员刘惠民、黄可斋外，还有抗战后迁往岳庄的民主人士李钦明、苏珍吾；原籍沂水城，抗战后迁往小高庄的韩锦荣、孙树人；城西黄石官庄的艾方兴；王庄区小南庄的刘葛民等。当时的参议员是由县直及各区的党、政、群团及地方上的抗日民主人士组成，共约五、六十人。

会议议程，主要是听取李贯一县长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然后议员们围绕抗日、支前及民、财、建、教等各项工作进行分组讨论。发扬民主，畅所欲言，对其后的抗日支前、拥军优属等各项县政建设征求意见和建议。

会议最后要求各参议员认真贯彻县政工作，广泛动员群众，在党和各级民主政府领导下，为完成抗日支前、拥军优属及民财建教等各项工作而努力。同时要求参议员与常设机构

及驻会的参议长和驻会议员保持经常联系，并反映群众的要求与建议。

这次大会进行了两天多的时间。大会的组成尽管始终贯彻了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及实行“三三制”的组织原则，但作为代表性来讲，较之建国后的人民代表大会是受到一定局限的。因此，从政治协商这一角度看，当时是受到客观限制的。例如沂水县的其它民主党派，有的代表选到上一级政权去了，本县的抗敌协会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而自行解体了。所以说代表面不够广泛。

两年后，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鲁中地区。沂水县参议长杨希古同县直机关的病、弱干部和教师等一道转移到黄河北去了。到1948年4月转移出去的同志都陆续返回沂水，而杨参议长于济南解放后在省直机关安排了新的工作，沂水县参议会至此也就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所以说这次新的参议员大会也是最后的一次大会。

江 波 整理